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 主 编 高登荣 黄彩文



祖先历史的变奏

——大理洱海地区一个村落的身份操演

赵玉中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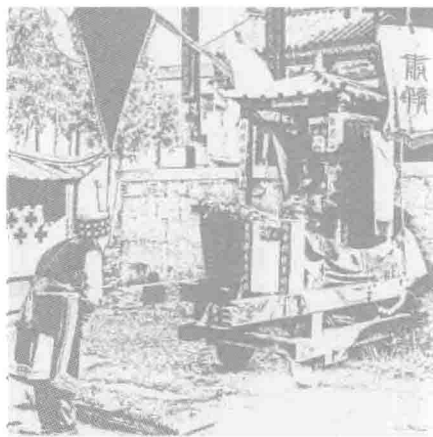
通过对大理洱海地区这一中国西南的边疆民族地区在不同社会历史情境下其社会文化“建构化”过程的人类学分析，作者意在呈现边疆人群的祖先历史叙事与其身份操演策略之间的复杂面相。这一超越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以来形成的“民族意象”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其地域文化多样性之间的历史关联，亦有助于消解或平衡将少数民族“历史实体化”与“文化本质化”的讨论。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 主 编 高登荣 黄彩文



祖先历史的变奏

——大理洱海地区一个村落的身份操演

赵玉中 ○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祖先历史的变奏：大理洱海地区一个村落的身
演 / 赵玉中著. —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ISBN 978-7-5482-1932-3

I. ①祖… II. ①赵… III. ①村落文化—文化史—研
究—云南省 IV. ①K29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2008号

策划编辑：邓立木 / 责任编辑：李 红 / 装帧设计：贺 涛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 / 总主编 和少英

云南民族文化遗产与变迁卷 / 主 编 高登荣 黄彩文

祖先历史的变奏

——大理洱海地区一个村落的身

赵玉中 著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7.75

字 数：355千

版 次：2014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2-1932-3

定 价：38.00元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650091

电 话：(0871) 65031071 65033244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本书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编委会

总 主 编：和少英

学术指导：马 戎 杨圣敏 王铭铭 彭兆荣 周 平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四代 王子华 王明东 方 桢 刘劲荣

那金华 李国文 李若青 张宗红 杨宗亮

陈 斌 罗海麟 赵静冬 郭飞平 高登荣

黄彩文 韩忠太 雷 兵

“云南民族文化丛书”总序

和少英*

云南因民族众多、文化丰富多样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一个天然宝库。自人类学与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学科传入中国以来，基于云南的田野调查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云南在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传播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调查和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传教士、专家学者、探险家以及外交官等先后进入云南，或窃绘山川险要，或记述边地的风土民情，并以此寻求通向中国的“走廊”或通道（譬如，英国铁路工程师兼情报官员 H. R. Davies 就写过一本非常流行的书，将云南称为“联结印度与扬子江的链环”——此书已于十多年前由我和我的同事们翻译出版）。其后，许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亦相继来到云南，与云南本土学者一道使这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逐渐开始发展起来。

纵观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逐步繁荣发展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30—40年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迁至云南，大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荟萃于此。尤其是吴文藻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实地调查工作站，由此开启了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魁阁时代”。以费孝通、陶云逵、许烺光、田汝康等为代表的“魁阁”成员，对云南各地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城乡关系的变迁等方面做了专题性的调查研究。其研究成果和社区研究方法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推动学科的中国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党和政府为了巩固边疆和加强民族团结，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识别，云南成为当时全国民族问题研究和民族工作的重镇。这一时期的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

* 和少英，男，纳西族，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暨云南省民族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兼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所长、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院长等职。

主要服务于国家的民族工作,呈现出较为鲜明的政治色彩。不仅为云南本土培养了一大批民族研究工作者,也给中国的人类学与民族学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与学术遗产。当然,本学科领域中受“左”的思潮影响以及“大跃进”等风潮的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第三个阶段就是改革开放至今,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发展的新时期。首先表现为相关的研究机构得以迅速恢复重建,不仅新增了大批研究人员,出版了一系列民族调查与研究的论著,而且还逐步展开了与海内外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机构或研究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于1979年初得以恢复重建,创办了《民族调查研究》《民族学报》以及《民族研究译丛》等刊物,推出了“云南少数民族简史、简志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以及“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系列丛书。1984年,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立民族学研究所,该所一直坚持了分民族研究的路向,出版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学术成果。云南大学等高校先后设置了民族学与人类学本科专业、硕士点以及博士点,于2001年开始招收博士生,并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建成了博士后流动站和国家级重点学科;通过组织对全省少数民族的典型村寨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形成了一批较高质量的专题调研报告,还精心摄录了一大批人类学与民族学音像带和照片,极大地推进了学科的发展。

经过上述三个阶段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繁荣发展,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首先,学科建设迅速发展。作为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具优势的学科,人类学与民族学发挥了国家级重点学科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带动了政治学、经济学、生态学以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国际和国内的学术交流合作也日趋活跃。其次,研究基础进一步加强。人类学与民族学相关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已遍及昆明、红河等州市,人员配置亦渐趋合理。尤其是2006年新建于云南大学的云南省民族研究院,通过整合资源、承担课题、培养人才,力图使人类学与民族学发展成为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其三,基础理论研究凸显特色。云南学者在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却相对薄弱,但近年来有些学者通过积极努力取得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尤其是关于生态文化、法律人类学、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民族政治学以及民族经济学等理论,已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应用性研究也大大加强。云南学者近年来将研究视角和关注点更多地投向了现实问题,突出表现在关注民族地区发展,维护边疆安全、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问题,涉及民族关系调适、社会文化变迁、生态环境保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

云南民族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高等院校之一。民族学是云南民族大学最具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不仅是云南省省级重点学科和省院省校合作共建的重点

学科,也是国家级特色专业。早在1979年,我校的民族学专业就开始招收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是云南首批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1987年至今招收本科生,是我省第一所开设民族学本科专业的高校,迄今已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高素质专门人才;2001年,我校的民族学被确定为省院省校教育合作项目——与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合作共建的省级重点学科,双方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术交流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北京大学还先后派出数名社会文化人类学专业博士生对费孝通先生主持“魁阁”工作时期的云南楚雄禄村、大理喜洲和德宏那木寨等著名人类学田野点进行再研究,出版了一批受到学术界广泛好评的研究成果,推动了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建设;2006年,民族学被列为云南省“十一五”重点学科;2008年被列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同年,民族学被列为国家立项建设的博士授权学科。经过近五年的建设,我校的民族学学科在人才队伍、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方面成绩斐然:出版学术著作50多部,发表论文300多篇;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36项;获国家社科基金课题40项,省部级课题50多项,各类项目经费总计2300多万元;主办或承办了“云南与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边疆民族关系与构建和谐社会学术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先后邀请美国伊利诺大学莱曼(F. K. Lehma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阎云翔教授,美国福尔曼大学白荷婷(K. P. Kaup)教授,英国伦敦大学罗兰(M. Rowlands)教授,中国社科院郝时远教授、刘世哲教授,北京大学马戎教授、王铭铭教授,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以及云南大学陈庆德教授等知名学者到校举办专题讲座。在几代民大人的共同努力下,我校的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点于2013年7月获得学位授予权,标志着我校在人才培养体系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在办学层次上实现了新跨越,为学校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和重要的平台。

云南民族大学的民族学学科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人才荟萃、成果丰硕。马曜、王叔武、宋恩常等一批著名的民族学家曾在云南民族大学长期从事民族学教学与研究,在民族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形成了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优良的学术传统。多年来,该学科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各阶段的中心任务,积极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成果:老一辈民族学家参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编撰出版了“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等影响巨大的成果,提出了“直接过渡”等重要理论,不仅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且为我国民族理论的丰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新一代学者主持完成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大湄公河次区域各民族如何迎接全球化的挑战”、美国大自然协会“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以及“中外民族学、文化

人类学研究比较”“滇川藏结合部区域经济协作与发展问题研究”“西部大开发与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多元化发展研究”“文化多样性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以大湄公河次区域为例”等一批国际合作与国家级重大项目和研究课题，出版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社会文化人类学丛书”等有影响的系列丛书。其中，受云南省政府的委托，云南民族大学于2001年与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完成了“滇西北民族文化与生态保护发展行动计划”的课题研究任务，其成果为三江并流地区世界自然遗产的申报成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96—2006年期间编写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史丛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规划的重点项目，对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从2002年开始，我主持并带领课题组成员历时多年先后完成了对金平傣人、莽人、克木人、俐侎人、他留人、撒尼人、老缅甸等云南特有族群的调查研究，出版的最终研究成果《云南特有族群社会文化调查》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2009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在昆明成功举办，不仅进一步扩大了云南在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界的影响，而且促进了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后，国家又先后提出把云南建设成为我国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和我国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的示范区，这不仅对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给云南民族学研究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然而，从以上对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历史与现状的简介中不难看出：在抗战期间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民族识别与调查期间，云南曾经是全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的中心，但随着老一辈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专家学者逐步逝去，新一代专家学者又出现“断层”，以及学术重心的迁移等种种原因，云南的人类学与民族学呈现出了“风光不再”以及被“边缘化”的趋势。怎样才能重振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雄风，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人类学与民族学贡献新的学术建树？这是当前云南学界亟须探讨的一个问题。云南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和民族文化强省的宏伟目标，为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认为当务之急便是培育全国一流的学科，培育全国一流的学者，推出全国一流的科研成果，并结合省情和特色以期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

要实现新形势下云南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的大发展、大跨越，形成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云南模式”，需要社会各方面长期的共同努力，而云南民族大学更是责无旁贷。因此，为打造更大的科研平台，建设更强有力的学术团队，我校由我领衔申报了2012年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并获得批准，项目经费高达1200万元，这也是云南民族大学建校以来获准立项经费最高的项目。以此同时，为充分利用我校民族学、民族语

言、民族艺术、民族理论与政策等学科专业齐全、人才荟萃、成果丰硕的优势,有效整合全校的民族学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进行“大民族学”建设,不断提升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于2012年12月挂牌成立了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下设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艺术研究所、民族体育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所、民族社会学研究所、民族教育研究所、跨境民族研究所、民族生态学研究所8个研究所。“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和云南省民族文化研究院的成立,为我校的民族文化研究搭建了重要的开放式科研平台,有利于推动民族学学科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当今时代,充分利用云南民族大学得天独厚的学科专业与人才资源优势,抓住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民族文化专业能力实践基地建设”和民族学一级学科成为国家新增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的契机,围绕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热点问题进行调查,推出一批民族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学校服务社会和传承创新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们策划并组织编写了这套“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分“云南民族文化传承与变迁卷”“云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卷”“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卷”“云南跨境民族文化卷”“云南民族艺术研究卷”以及“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卷”六个系列。本套丛书主要收录我校教师近年来民族文化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云南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婚姻家庭、宗教信仰、节庆习俗、族群认同、传统体育、民族艺术以及民族文化保护传承与繁荣发展等诸多方面,较为全面地展现了云南民族大学在民族学学科建设方面取得的新进展。

总体而言,“云南民族文化丛书”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色:

第一,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本套丛书秉承民族学研究的优良传统,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丛书中既有对民族文化保护传承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专著,也有对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深入调查的个案研究。丛书力求从不同的视角来探讨当下云南民族文化多样性及其繁荣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提出全球化与现代化语境下民族文化保护传承的路径选择,必将为促进云南民族文化强省建设和民族文化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相结合。长期以来,云南民族大学一直坚持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并重的原则,以学科建设推动人才培养,以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本套丛书既有关注民族文化的学术专著,也有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系列教材。例如,内容涉及纳西、傣、彝、傈僳、景颇、拉祜、哈尼、苗、壮、佤等11个语种的语音、文字、词汇、会话等方面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教材,以及陀螺运动、秋千运动、蹴球运动、射弩运动、高脚竞速运动等云

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材的出版,不仅对促进民族学学科和专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而且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自20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开创了人类学现代田野工作范式以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经典的民族志著作,无一不是建立在深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而近年来的民族学研究在倡导田野调查的同时,也强调了历史文献资料对民族志文本撰写的重要性。本套丛书的另一特色是注重田野调查与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丛书中的不少专著,就是其作者在长期深入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获取大量鲜活的第一手素材并参考借鉴了云南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撰写的。

第四,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云南民族大学老一辈学者的民族学研究成果,曾经为党和国家制定民族政策、做好民族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为民族文化遗产和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套丛书立足于国家战略的高度,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关注底蕴深厚、异彩纷呈的云南民族文化及其繁荣发展与保护传承问题,力求为云南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的建设以及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跨越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传承是学术创新的重要源泉。我们不揣浅陋呈现给读者的这套丛书,既是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的标志性学术成果,也是我校民族学博士学科建设取得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对提高我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推动民族学学科建设、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繁荣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时间仓促和编撰者水平有限等种种原因,这套丛书肯定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我们诚恳期待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2013年国庆于昆明莲花池畔

目 录

第一章 导 论	(1)
第二章 地域网络中的洱村及其日常生活	(23)
第一节 洱村今昔	(23)
一、由“城”到“村”	(23)
二、“村”的生计	(29)
第二节 洱村的社会空间	(35)
一、家	(35)
二、登	(47)
三、莲池会	(50)
四、老人协会	(59)
五、村	(62)
第三节 行政与仪式空间中的地域关系	(68)
一、洱村与金圭寺村	(68)
二、洱村与“喜洲十六村”	(70)
三、洱村与中和邑和江上村	(73)
四、洱村与更广阔的地域空间	(74)
第四节 洱村的社会结构	(80)
第五节 分析与小结	(86)
第三章 “名家大姓”：摇摆 in “汉/夷”之间	(91)
第一节 姓氏、祖先与族群认同	(92)
第二节 “名家大姓”与喜洲及其姓氏来源	(93)
一、“名家大姓”与喜洲	(93)
二、“名家大姓”的姓氏来源	(96)
第三节 14 世纪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名家大姓”的祖源表述	(99)
一、墓志铭中的祖源表述	(100)

二、族谱中的祖源表述·····	(104)
第四节 祖源表述与社会情境·····	(120)
第五节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名家大姓”的祖源表述·····	(130)
第六节 祖源表述与族群认同：“摇摆”在汉/夷之间·····	(137)
第七节 分析与小结·····	(143)
第四章 白族历史和文化的知识生产·····	(147)
第一节 白族历史的书写·····	(148)
第二节 民族“历史实体化”·····	(157)
第三节 白族文化的书写·····	(164)
一、白族语言·····	(164)
二、“本主”研究·····	(167)
三、莲池会与洞经会·····	(179)
四、“绕三灵”仪式·····	(183)
第四节 民族“文化本质化”·····	(189)
第五节 分析与小结·····	(194)
第五章 洱村的身位操演·····	(198)
第一节 洱村的历史文化叙事·····	(198)
一、洱村“记忆”·····	(198)
二、从河神、龙神到本主神·····	(204)
三、何一琪的“本主”故事·····	(211)
第二节 地域社会中的文化阶序·····	(216)
第三节 “构组文化”与“实践文化”·····	(221)
第四节 “本主文化节”与“绕三灵”·····	(226)
第五节 文本、情境与族群认同·····	(239)
第六节 分析与小结·····	(243)
第六章 结 语·····	(247)
参考文献·····	(252)
后 记·····	(268)

第一章 导 论

文本、情境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近年来曾引起学界较多的讨论。曾有学者认为,宣称一个新的祖源即等同于宣称一种新的族群认同。^①亦有学者提出,基于姓氏之上的祖源论述是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在面对外来社会力量时的一种文化调节机制。^②

不过,目前有关此议题的相关论述似仍有进一步商榷的空间。笔者在梳理大理洱海地区文献(正史、方志,以及墓志铭、族谱等民间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尽管在历史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明中期以后,“名家大姓”的祖源叙事呈现出由“夷”到“汉”的转变过程,但官方史志对其族群身份的记述,与其对自己族群身份的表述之间,一直存在分野。

约在东汉时期的汉文献典籍中,中国西南地区便有所谓“部曲大姓”的相关记载。据晋人常璩(291—361年)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南中地区的大姓即有焦、雍、雷、爨、孟、董、毛、李、王、周、魏、庞、赵、杨、骆、陈、霍、吕、姚等姓氏。其中,孟、爨是滇东的“大姓”,而董、赵、王、李、杨等则是滇中与滇西的“大姓”。^③虽然常璩并没有说明这些“部曲大姓”的具体来源,但据台湾历史学者连瑞枝的研究,在公元8世纪以前的历史文献中,大理洱海地区的姓氏往往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具有姓氏的往往是名家贵族;第二,名家贵族往往根据他们所具有的姓氏来宣称他们是中原正统圣王的后裔。^④

唐人梁建芳的《西洱河风土记》(648年)亦载,“其西洱河……有数十姓,以杨、李、赵、董为名家。……自云其先本汉人……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庄蹻

①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3页。

② 连瑞枝:《姓氏与祖先——云南洱海地区阶序社会的形成》,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4卷第2期,第1~36页。

③ 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四《南中志》,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357页。

④ 连瑞枝:《姓氏与祖先——云南洱海地区阶序社会的形成》,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年第4卷第2期,第1~36页。

之余种也。”^① 据此，初唐时期，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曾声称自己的祖先原本是“汉人”，他们乃战国时期“王滇”的楚将“庄蹻”^② 的遗裔。伊佩霞（Patricia Ebrey）认为，“姓氏”是中国周边的非汉部落社会卷入“华夏我族”族群认同的一个重要媒介。^③ 依此，无论“名家”是否确为楚将“庄蹻”的遗裔，从其关于祖先来源的“自述”中可以得知，他们曾一度试图“攀附”在“华夏”的祖先系谱之上。

而在南诏政权（738—902 年）兴起之后，中原文献即将大理洱海地区的杨、李、赵、董等“名家”或“大姓”皆视作“蛮”。如，唐人樊绰的《蛮书》（863 年）称，“蒙舍，一诏也，居蒙舍川，在诸部落之南，故称南诏也。姓蒙，贞元年中，献书于剑南节度使韦皋，自言本永昌沙壹之源也”。又，“越析诏，有豪族张寻求”，“青岭蛮，有首领尹氏父子兄弟”，及“渠敛蛮，大族有王、杨、李、赵四姓”^④。尽管南诏蒙氏的来源与洱海地区的赵、杨、李、董等“名家大姓”可能有所不同，因他们行“父子连名制”，没有“姓氏”，且在历史文献中多被列为“乌蛮”，与被称为“白蛮”的“名家大姓”似为不同分类的族群，但当南诏统一六诏之后，在奉使到唐朝时，却抬出与“黄帝”和“庄蹻”相对抗的“沙壹”作为自己的始祖。连瑞枝认为，这一祖源表述的重大变化，是因为南诏地方王权的建立改变了当地“名家大姓”的“汉人”祖先认同，使得一度具有部落阶层性意义的“汉人姓氏”成为南诏王权统治贵族的符号。^⑤ 石钟健先生则认为，南诏宣称他们是“哀牢夷”的后裔，目的是“为了向唐王朝示好”，因为在《后汉书》这类较早的汉文献典籍中，就有“哀牢夷”和“沙壹”的记载。^⑥ 而在笔者看来，南诏王室的这种祖源表述，无论是“向汉人示

① 梁建芳：《西洱河风土记》，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二卷，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8 页。

② 据《史记》，楚将庄蹻曾“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昆明大观楼建成之后，孙髯翁作《大观楼长联》。此联上写滇池风物，下写云南历史。“庄蹻王滇”这一历史典故即载于下联。不过，对楚人“王滇”一事，史书的记载却多有出入。如，在《史记》中，为楚威王时（公元前 339—前 329 年）之“庄蹻”，而在《后汉书》中，则为楚顷襄王时（约公元前 276 年前后）之“庄豪”。

③ Patricia Ebrey. “Surnames and Han Chinese Identity”, in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edited by Melissa J. Brown.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pp11-36.

④ 樊绰：《蛮书》，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 1998 年，卷三“六诏”，第 9，11~12 页；卷四“名类”，第 16 页；卷五“六险”，第 35 页。

⑤ 连瑞枝：《姓氏与祖先——云南洱海地区阶序社会的形成》，载《历史人类学学刊》2006 年第 4 卷第 2 期，第 1~36 页。

⑥ 石钟健：《论哀牢九隆族和洱海民族的渊源关系》，载《石钟健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10 页。

好”，还是有意利用汉文献的记载来合理化自己与华夏之间的区隔，从作为南诏王权统治贵族的“名家大姓”的情形来看，南诏王室的祖源表述无疑具有族群认同建构的意义。

1253年蒙古人征服大理之后，在洱海地区设立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此时，大理国王室段氏在元王朝的行政体制中已被降级为土司，协助元朝中央政府控制大理及其周围地区。不过，在元人的记述中，洱海地区“名家大姓”的衣冠文物皆“略本于汉”。如，据至元年间（1264—1294年）曾在大理游历的郭松年的记述，“故大理之民，数百年之间五姓守固。……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陈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①在稍后李京的记录中，“名家大姓”则已由唐人樊绰笔下的“蛮”成为“人”：“白人，有姓氏。……故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皆僰人，今转为白人矣。……其俊秀者颇能书，有晋人笔意。”^②遗憾的是，从此寥寥数语之中，我们既不清楚为何此时的“僰人”已转变为“白人”，也不明白“白人”与“僰人”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1382年，明朝征服大理之后即废除了原大理国王后裔、元朝世袭大理总管段世的土职，设流官知府（大理府），并开始登记里甲与编户。其中，太和县（小于今大理市的辖区）“编户六十六里”^③。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从此成为明中央王朝的“编户齐民”，纳粮当差。即便如此，此后官方文献对他们族群身份的记录则仍一直将其视为一个有别于“汉人”的群体。

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大理……由唐以来，蒙、段氏据而有之者，始六百年。二氏皆僰人。西南夷为类虽杂，知文教者惟僰焉”。该志将那些“近城”的“僰人”称为“汉僰人”，并特别指出，他们“俗本于汉，民多士类。郡中之民，少工商而多士类，悦习经史，隆重师友，开科之年，举子恒胜他郡，其登黄甲跻华要者今相属焉”^④。在此后编纂的正德《云南志》中，“汉僰人”一词则已被广泛用来指称大理府之内的所有“僰人”。^⑤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万历《云南通志》（1576年）的编纂者，嘉靖丙戌

① 郭松年：《大理行记》，载郭松年、李京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页。

② 李京：《云南志略·诸夷风俗》，载郭松年、李京撰，王叔武校注《大理行记校注·云南志略辑校》，云南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第86~96页。

③ 李贤等：《明一统志·云南布政使》，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④ 陈文纂修：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五“大理府”，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80页。

⑤ 周季凤纂修：正德《云南志》卷三“志”三“大理府”，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143页。

(1526年)进士大理人李元阳(1497—1580年),则仅将云南的“蛮夷”划分为两个大类——“僰夷”与“爨蛮”,称“僰夷在黑水(即今澜沧江)之外”,“爨蛮在黑水之内”。他进而解释说,所谓“僰夷”,“即今之所谓百夷也,‘僰’、‘百’声相近,盖音讹也”^①。换言之,在李元阳的分类中,“僰”一词似用来专门指称居住于澜沧江以西的“百夷”(即今“傣族”),而居住于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则既不属于“僰夷”,更不属于“爨蛮”。如此,被李元阳“去僰化”之后的“名家大姓”“非僰非爨”,似已等同于“汉人”。明万历年间曾在云南布政使司任右参政的福建长乐人谢肇淛,在其约于1620年撰写的《滇略》中,继承了李元阳对云南“蛮夷”的分类。^②

然而,在刘文征的天启《滇志》(1632年)中,李元阳笔下大理洱海地区“非僰非爨”的“名家大姓”,却再次被记述为一个有别于“汉人”的群体——“白人”：“白人，古白国之支流也。旧讹僰为‘白’，遂称其一类，实不相通。滇郡及迤西诸郡，强半有之。习俗与华人不甚远，上者能读书，其他力田务本，或服役公府，庶几一变至道者矣。”^③云南地方文人及民间对于“古白国”^④王权历史的强烈记忆，可能是刘文征将“名家大姓”视为“白人”的主要原因。不过，他在这段文字中亦明确地指出了前人将“僰”讹为“白”的错误，说明“白人”与“僰”并无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李元阳与谢肇淛的看法。此后清至民国时期的正史文献，大体沿袭了刘文征的记述，均将大理洱海地区的“名家大姓”记为“白人”，并另称为“民家子”。^⑤

不过，洱海地区周围府县的地方史志则仍将“白人”记为“僰人”，并认为他们是“中土”移民之后。如，据《康熙鹤庆县志》载：“本郡人有四类：一曰汉人，即一所军也；一曰僰人，其初亦中土人，但世远俗移，非华非夷，自成一类，迄今丕变文物，与中州等；一曰罗落，分黑白二种；一曰伯彝，性耐岚瘴，

① 邹应龙修，李元阳纂：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羁縻志”第十一，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4~648页。

② 谢肇淛撰：《滇略》卷五“夷略”，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六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71~788页。

③ 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④ 在大理洱海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在南诏国建立之前，洱海地区的南部白崖一带（今弥渡）曾有“白国”。后，白王张乐进求将王位禅让于南诏蒙氏。元末明初之后的地方野史，如《白古通记》、诸本《南诏野史》及清初的《白国因由》等书，逐渐将洱海地区的王权历史抽象为“白国”或“白子国”。至今，在洱海地区的民间，仍广泛地保留有“白国”的各种历史传说。如，在洱海地区一年一度的“绕三灵”仪式中，民间仍在流传白王、三公主金姑与南诏始祖细奴逻的故事。

⑤ 方国瑜认为，天启《滇志》雕版之后，“前修诸本云南志流传已稀，而此本较多，故明末清初言滇事者，明以前之故实多出自此书。……后之作者沿袭之，故此书对后来之影响甚大”。参见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七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迁徙无常。”^①这里记述的“𑖀人”与《康熙大理府志》对“白人”的记载基本一致：“族多白人，俗与汉人等。其自外来而长子孙者，今亦为土著。婚嫁丧祭，悉遵家礼。”^②而在远离大理洱海地区的顺宁府（今临沧地区的风庆县），那些来自洱海地区的“民家子”因其所操之“彝语”而被认为是“以彝从汉”：“民家子：此多大理、剑川来者。彼以彝从汉，自称为民家。即如民家曲，实彝语也。能知汉语，识字读书。”^③据此，无论是“非华非夷”还是“以彝从汉”，“能知汉语，识字读书”的“民家子”，在其周围群体看来，身份十分的模糊。

而在洱海地区元明以来的民间文献中，“名家大姓”对其祖先来源的表述，则与官方史志的记述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比如，在大理段氏总管时期，“名家大姓”在其墓志铭中往往会宣称他们是楚将庄蹻部属的后裔，或籍其姓氏的地望（如“清河张”“弘农杨”等）而将其祖源联系到中原。约在1440年至1500年之间，则转而宣称他们是“九隆族之裔”“婆罗门种”或“印度阿育王之裔”。^④有人认为，这类祖源表述是“名家大姓”对明朝在大理洱海地区进行“夷夏之辩”的抵制，受到了约于元末明初成书的《白古通记》^⑤一书的影响，是白族民族意识增强的表现。^⑥

1500年以后，“名家大姓”在其墓志铭中已少有“九隆族之裔”和“印度血统”的祖源追溯，但在洱海地区却仍有许多关于佛教圣地的传说——苍洱是“妙香城”，甚至还有云南地处“古天竺”的说法。这些传说虽颇为荒诞^⑦，但在明清以来的大理地方文献中却有着非常详细的记载与细致的描述。如，李元阳在其编纂的嘉靖《大理府志》（1563年）中，就曾引经据典地证明“点苍山为灵

① 佟镇纂：《康熙鹤庆县志》，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翻印，1983年，第67页。

② 黄元治纂修：《康熙大理府志》卷十二“风俗”。民国二十九年，大理严镇圭重印本。

③ 雍正《顺宁府志》卷九“风俗·民家子”，载杨滋荣整理、点校《顺宁府（县）志五部》，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168页。

④ 阿育王（King Asoka）是历史上首位莫立并使用佛教意识形态的治国者，即以佛教“转轮王”或“法王”的面貌统治印度。在南诏劝丰佑时代（823—859年），印度僧人已将金刚顶的瑜伽密教法门系统地传入大理洱海地区。就目前保留的文献及实物来看，南诏、大理自9世纪之后便长期使用金刚顶莫立的观音佛王传统治国。参见古正美《从天王传统到佛王传统——中国中世佛教治国意识形态研究》，商周出版社2003年版，第10、440、450页。

⑤ 佚名撰：《白古通记》，载王叔武辑著《云南古佚书钞》，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0~69页。

⑥ 侯冲：《白族心史》，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

⑦ 马长寿认为，西藏佛教经典中有关吐蕃王朝出自古代印度佛国及藏族的祖先皆起源于印度的说法，乃吐蕃佛教王权和西藏佛教僧人的杜撰，此种说法十分荒唐无稽。他同时指出，若照《南诏野史》的说法，则云南的白族、彝族，西藏的吐蕃，中国各地的汉人都是印度阿育王的子孙了。参见马长寿《辟所谓“西藏种族论”并驳斥经史内所流传的藏族起源于印度之谬论》，载马长寿著、周伟洲编《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6~352页。